

# 天主教与云南少数民族

Roman Catholicism and the Minority Peoples of Yunnan Province

韩军学 云南社会科学院

Han Junxue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英文提要]

This paper surveys the progress of Roman Catholic Church as it proselytizes among minority groups in Yunnan. It is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minority churches, their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This data will enable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multi-face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ristian Church and the minorities, and its impact it has on the people.

## 一、天主教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概况

由于天主教在云南的历史较基督教更为长久,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活动早在清道光以前就已开始了。在此之前,虽然已有不少天主教信徒零星散布各地,但并未建立起教会组织,传教活动也没有实际展开。<sup>①</sup> 17世纪下半叶时,由于受四川教会的影响,川滇两省交界的滇东北彝族和苗族地区,已聚集了不少由四川迁徙而来的移民信徒,主要集中在两省交界的大关和盐津等县的偏

<sup>①</sup> 此时的信徒多源于历年的内地战乱及充军发配而被迫入滇者,其信仰并未形成公开的活动。

僻山村,受四川教会辖制,并在那里开办了云南最早的天主教会,使这一地区成了天主教当时在云南活动的中心,由此而拉开了天主教在云南以及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帷幕。

1805年以后,由于各地禁教之声日紧,内地逃迁或被发配到云南的信徒逐渐增多,除滇东北地区的信徒人数有较多增加外,滇西的白族地区也出现了不少尚未公开活动的天主教信徒。据有关材料的统计,在此期间,云南天主教的信徒人数,从1809年的2500人,增加到1840年的4000人。<sup>①</sup>

在信徒人数有了较大增长的基础上,1840年云南教区再次设立,<sup>②</sup>主教公署即设于教会历史最为悠久的滇东北地区的一个叫作“龙启”的偏僻小山寨里,以此为据点致力于向邻近地区扩张,同时,传教士们在这一时期也在滇西白族地区建起了一些教堂。

当天主教会的扩张触角刚刚伸展到滇东北以外的地区时,1856年爆发的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民大起义。历时18年,遍及全省大部分地区,滇西和滇中腹地的教会势力尚未兴旺便遭摧毁,只有滇东北的教会力量损失较小。依旧作为教会的扩张基地而发挥着作用。

杜文秀起义失败后,在滇东北少数民族地区蓄势已久的天主教立即自下闯入昆明,于1876年在昆明建起了教堂,并在下久之后将主教座堂从僻远的龙启迁到昆明,从此开始了在云南各地的全面扩张。以天主教会南下昆明为转折点,教会在云南以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为主的活动逐渐由以城镇和内地农村为主的活动所取代。尽管在这一时期,仍有不少传教士深入到了滇西北傈僳族和藏族地区、滇南苗族地区以及滇中和滇东彝族地区,但此时的教会

<sup>①</sup> 见秦和平,《云南天主教史料四则》,载《云南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

<sup>②</sup> 天主教云南教区最早曾于1696年设立,但先后两任主教均未到任,实际工作也未展开。1755年以后,云南教区撤并归入四川教区,传教事务由四川宜宾的司铎负责。

扩张活动,主要是以昆明,大理和曲靖三大中心城镇及其邻近的农村地区为主而展开的。

教会活动由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向城镇和内地农村的转移,给云南天主教的传播和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成效,从而形成了云南天主教史上的快速发展时期。经过这一时期积数十年的传播努力,到了上个世纪末,云南天主教已初具规模,拥有大约 50 座教堂和 1 万余名教徒。然而,由于天主教会的大规模扩张活动,引起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急剧激化,导致了教案高发时期的形成。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与教会扩张活动相伴生的教案和仇教事件迭起,在短短的不足 30 年间竟多达 10 余起,有力地遏制了天主教在云南的扩张和急剧膨胀。在此期间,尽管教会在历次教案中获得了大量的“赔款”和种种传教特权,使其在各地的教堂建设方面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由于教案的影响,教会的社会声誉却大大降低了,因而这一时期的教会发展,呈现出教堂增长迅速而信徒人数增加缓慢的趋势,有材料表明,自上个世纪末到 1920 年前后的二三十年间,云南的天主教堂增加了一倍有余,而教徒人数只增加了大约 50%。

到了本世纪 20 年代以后,在内地教会难有发展的情况下,云南天主教的扩张重心开始逐渐转移到了云南西部边疆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并由此推动了教会的又一次快速发展。

在滇西北地区,自 20 年代教会放弃以此为跳板北上进藏的企图,特别是自 1930 年瑞士伯尔纳铎会进入该地,逐渐接替了巴黎外方传教会对当地的教务管理之后,教会在当地藏族,傣族、纳西族和怒族等少数民族中有了较快发展,在教堂数量增加不大的情况下(从大约 10 所增加到 15 所左右),成功地使信徒人数从 1920 年前后的不足 500 人,增加到 1950 年时的 2300 人。

在滇西地区,自 1921 年在盈江县沙坡傣族地区开办了教会之

后,特别是1929年大理教区设立,伯大郎圣心司铎会接替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教区教务之后,传教士们便不断深入到中缅边境的景颇族和傣族地区传教,先后在莲山(今属盈江县,1930年)、梁河(1931年)、陇川(1932年)、瑞丽(1933年)等县建立了教会组织,到1950年时,共有教堂10余座,信徒近1000人。

在滇西南拉祜族、佤族地区,自1928年在澜沧县大平掌开办了教会之后,大理教区不断派遣传教士到当地活动,积极向邻近地区扩展,到1950年为止,共在澜沧县和临近的思茅县境内建起了50余座大小教堂,发展信徒7000余人。其中仅在澜沧北部的拉祜族和佤族聚居区域内,就有教堂30余座、信徒4200余人。

经过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天主教在云南的教堂数和信徒人数,分别从1920年前后的130余座和1.6万余人,增加到1950年前后的大约150座和近3万人,但是,从上述天主教在云南西部的发展情况来看,无论在教堂建设方面,还是在信徒发展方面,这种增长几乎全部都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的,而在内地则不仅没有增长,相反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云南天主教发展的基本态势。

云南的天主教自上世纪初以滇东北少数民族地区为立足点,开始了在云南的传教活动,历经百年之后,终于又以在滇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大规模扩张而回到了面向少数民族的出发点,大致形成了以云南东部的彝族和苗族、西部腹地的白族以及西部边疆大片地区的多种少数民族为中心的基本状况,并在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周而复始的传教重心的转移,以及教会分布状况的形成,构成了天主教在云南发展演变的基本轨迹,也为天主教在云南的活动增加了不少民族色彩,并由此而形成了与基督教活动的可资比较的特点和差异。

## 二、信仰天主教的少数民族

经过数百年的苦心经营,特别是经过本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在滇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发展,云南天主教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使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以下根据天主教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分布情况分而述之。

### 1、东部地区的彝族和苗族

彝族和苗族在云南的分布虽然很广,但天主教在其间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云南东部地区。昆明以西大片地区的彝族和苗族,尽管有部分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但却基本上没有受到天主教的影响。

东部地区是天主教在云南最早开展活动的地区。这一地区的彝族和苗族是最早受天主教影响的少数民族。早在18世纪中期以后,与四川接壤的滇东北地区的彝族中,就有不少人接受了天主教信仰,并在四川教会的主持下,于清乾隆年间在大关厅龙潭乡龙风场(龙启,今属盐津县)建起了云南最早的一座天主教堂,建立了教会组织,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时,还在当地开办了四川修道院(预修院),<sup>①</sup>从事初级传道人员的培训工作。

自龙启教会开办以后,传教士们以此为基地不断向邻近地区扩展,先后于嘉庆年间和道光年间在邻近的大坝乡成风山以及仁里乡叭耳岩、吉照乡石砌子(田坝头)等地建起了教堂,<sup>②</sup>至1856年杜文秀起义之时,教会势力在大关和盐津二县的彝族地区已有了较大的影响,并在当地的苗族中发展了部分信徒,由此开始向云

<sup>①</sup> 该修道院创建之后,因地势崎岖,闭塞偏僻,供养不易,故于1782年迁至四川宜宾落壤沟。此后一段时间内,根据两地禁教程度的不同而在其间来回迁移,直至1819年被查封为止(见《云南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秦和平文)。清道光三四年间(1823—1824年间),龙启再建修道院。

<sup>②</sup> 《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八,宗教考八,天主教。

南东部的大片彝族和苗族聚居地区扩张。此后,虽历经杜文秀起义以及教案高发时期仇教事件的影响,但对云南东部地区教会的冲击不大。在出现了短暂的停顿之后,教会南下滇东和滇中腹地的扩张活动又开始了,先后在滇东北的彝良、昭通、镇雄、巧家、会泽,滇东的曲靖、路甫、陆良、弥勒、泸西,师宗,以及滇南的开远、文山、砚山、屏边等县(市)的许多彝族和苗族村寨建起了教堂。至本世纪中期为止,天主教在云南彝族和苗族地区共设立了大小教堂30余所,发展信徒约8000人,其中彝族约5000人,苗族约3000人。

## ·2、滇西北地区的藏族、傈僳族和怒族

鉴于滇西北地区与西自自治区在地理、民族等方面的联系,天主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活动,首先是为了建立北土西藏的桥头堡而开始的。早在1624年,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便在邻近印度的古格王国首府泽布隆(今西藏札达县)建起了教堂,但因难以立足而于1640年撤出。时过200年,借鸦片战争爆发之机,巴黎外方传教会率先挺进西藏,几经波折之后,终于1848年在滇。藏边区的博木格(今西藏察隅县崩高村)建立了教会。但由于各列强国家的排挤和限制,教会未能进一步深入,不得不退到四川和云南境内做长远的打算。

1857年,传教士在西藏外围地区的传教活动初见成效,在四川康定藏族地区开辟了传教据点,并以此为基础设立了“西藏教区”(宗座监牧),开始向邻近地区扩展,于1861年以后进入滇境,逐渐在藏族聚居的德钦县以及傈僳族和怒族聚居的维西县和贡山县开办了教会,继而在此基础上设立了“西藏教区云南铎区”,由此开始了天主教在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进程。

自1862年至1864年间教会在云南藏族聚居的德钦县燕门乡茨菇村建起教堂以后,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传教士们又先后在

阿墩子(1872年,今德钦县升平镇)、燕门乡茨中村(1909年)和巴东村(1905年至1910年间)等地建起了教堂,并开办了教会学校和女修院,发展信徒数百人。

但是,由于藏族文化的强烈的排斥作用,教会在这一地区的处境十分艰难,发展信徒的工作浪难开展。据1894年茨中土弁钱国栋的呈文,“查顾(德尔)教士同任(安收)司铎在阿墩子设立教堂十余年,并无居民从教。其左右伺应供役者,仅川民数名。该处蛮夷人等,大教皆格格不相入者。”<sup>①</sup>此外,随着列强国家侵藏步伐的加快,这种排斥力也日益强化,教会势力在教案和仇教事件的冲击下,遭到了严重打击。例如,1892年阿墩子教堂的传教士被逐,1905年则更因四川巴塘教案的影响,爆发了影响颇大的维西教案,致使教会势力遭受重创,不仅阿墩子、茨菇等主要教堂被毁,澜沧江、怒江沿岸的各地教堂、经堂也几乎损失殆尽。此后,教会虽借助巨额赔款重整旗鼓,在各地广设教堂,延揽信徒,但终成未势,未能获得持续发展。

本世纪初以后,由于天主教在藏族地区所受的强大阻力,教会势力在难以北进的情况下,逐渐向南延伸到了傈僳族和怒族地区。特别是自20年代教会放弃进藏企图,西藏教区更名为“打箭炉教区”(俗称康定教区),致力于在藏区外缘发展以来,滇西北地区的传教士们很快在贡山县北部与德钦县和西藏接壤的藏、怒杂居地区,以及维西及其以甫的傈僳族聚居地区扩展了教会势力。

天主教在傈僳族和怒族地区的扩张活动,以地处滇西北地区藏族及傈僳族和怒族的地域分布结合点的小维西(今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白济汛乡统维村)及贡山县的白哈罗为始端。早在1881年,传教士即在小维西开办了教会,并于次年在附近的吉岔设立了

<sup>①</sup>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五辑。

分堂,以此为据点向傣傣族聚居地区的纵深发展,先后在维西县的花园箐、花落坝等地建起了教堂,并开设了教会学校、修道院、施药点和养老院等设施,在当地的傣傣族中发展信徒数百人。同时,自传教士于1900年在贡山县丙中洛的白哈罗村建起了教堂之后,天主教逐渐在当地的怒族和西藏族中产生了影响,1905年爆发的教案,虽使这一地区的天主教活动痛遭打击,但教案结束后,教会便利用巨额赔款先后在邻近的中丁,青纳桶、查腊、彭当等地建起了教堂,并利用当地佛教寺院赔偿给教会的土地为手段,发展了500余名信徒(其中大多数是怒族)。

此外,在教会向藏族和傣傣族地区扩展的同时,由于藏族和傣傣族的影响,分散在当地的纳西族也而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例如,在以藏语为通行语言的茨中、巴东,以汉语为通用语言的维西县小维西,以及以纳西语为通用语言的维西县吉岔等地与藏族和傣傣族杂居的纳西族中,均有不少天主教信徒。<sup>①</sup>

### 3、滇西腹地的白族

白族也是受天主教影响较早的少数民族之一。早在清嘉庆年间,由于内地严行禁教,不少教徒被发配云南,其中有一些就来到了白族地区。但此时的信徒并未公开活动,大概也没有白族信徒。因而天主教在此时在白族地区的影响当是极为有限的。此后,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时,白族地区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在邓川州(今属洱源县)小米庙(又名水椎房,今名大坪子)始告建成,<sup>②</sup>并在白族地区有了一定的影响。据白族教徒的历代口传,在19世纪中叶的杜文秀起义之前,位于白族文化中心的洱海地区的挖色等地,曾形成了白族信教材,并有了白族神父,后因起义战乱而毁之殆尽,未能流传至今。

<sup>①</sup> 参见《迪庆藏族自治州宗教志》中有关天主教部分。

<sup>②</sup> 《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八,宗教考八,天主教。

杜文秀起义失败以后,随着时局的平稳及天主教主教公署由僻远的滇东北边地南迁昆明之后,教会在白族地区的扩张活动又告兴起。自清光绪元年(1875年)以后,短短的不足10年之间,教会就先后在白族聚居地区的永北厅(今永胜)旧衙坪(1875年)、马上(1881年)、片角新街(1883年)、狸黑乡(1883年)、太和县(今大理)东城高家巷(1875年)、浪穹县(今洱源)么梭营(今名孟福营,1876年)、沙凤村(1881年)、永平县曲硐村(1877年)、蒙化厅(今巍山)漾街柴户(1881年)等地建起了教堂,<sup>①</sup>发展信徒数百人。

随着教会扩张活动的加剧以及传教士殖民气焰的日益嚣张,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自1883年开始的短短两年时间里,浪穹、蒙化、永北、永平等地教案迭起,白族地区的天主教遭到了各种教案和仇教事件的全面打击,严重削弱了教会在当地的势力,有力地遏制了天主教在白族地区的扩张进程,直到20年之后,天主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活动才逐渐恢复起来。然而,尽管自1904年以后,教会又先后在宾川县的平川诸苦拉(1904年)、古底五里村(1904年)、南门街(1906年)、永胜县城南正街(1906年)等地相继建起了一些教堂,<sup>②</sup>但很快又受到了1908年爆发的宾川教案的冲击,并从此丧失了在当地积极扩张传教的活力。

本世绍29年代以后,鉴于教会在白族地区难以发展的局面,传教士们逐渐把注意力转到了滇西边境一线的少数民族地区,企图在那里获得持续的发展。特别是在1922年伯大郎圣心会进入大理,取代了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当地的教务管理,以及1929年大理教区(宗座代牧)设立之后,教会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扩张步伐也就日益加快了。

<sup>①</sup> 参见《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八,宗教考八,天主教;李飞泉:《大理天主教史要》,载《云南宗教研究》1989年第2期。

<sup>②</sup> 参见《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八,宗教考八,天主教;李飞泉:《大理天主教史要》,载《云南宗教研究》1989年第2期。

#### 4、西部边疆的少数民族

云南西部的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地区,居住着景颇、德昂、阿昌、傣、拉祜、佤、基诺、布朗等诸多少数民族。其中德宏州北部盈江县的部分傣族和景颇族,思茅地区西部的部分拉祜族和佤族群众,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天主教的影响,由此而形成了云南天主教活动的又一主要类型。以下分述之。

##### 1) 傣族和景颇族

天主教在傣族和景颇族中的传播,始于本世纪20年代,其时,伯大郎圣心司铎会初入滇西,在尚未接替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当地传教工作的情况下,先行在边疆地区开展传教活动,1921年,法国传教士郑绍基(Lucier Lacoste, 1948年任大理教区主教)在德宏州北部的盈江县沙坡傣族地区首开传教记录,在那里建起了教堂及教会小学,并逐渐向邻近地区蚕食扩张,至50年代初停止活动为止,共在蛮坏、弄保、拜掌、顶(喊)撒、新抛山、允喂等地建起了6个教堂,<sup>①</sup> 发展傣族信徒100余人。

与此同时,自1929年大理教区设立,伯大郎圣心会成为大理教区的主管修会以后,教会在滇西地区的传教重心,很快便由滇西腹地的白族地区转向边疆地区,以沙坡教会为据点,逐渐向南扩展到了景颇族地区,1930年以后,先后在陇川县的弄贤、垒保、弄贯、盈江县的恶穹和瑞丽县的等戛、户兰等地建起了11座大小教堂,发展信徒200余人,1951年,垒保教堂成为景颇族地区的教会总堂,负责德宏各县教会活动。此后教会发展较快,至1958年停止活动为止,教堂虽减少为4座(垒保、弄贯、恶穹、等戛),信徒人数却很快增加到约900人(其中陇川500余人,瑞丽和盈江各近200人)。

<sup>①</sup> 《盈江县宗教调查综合材料报告》(1955年),盈江县档案馆:47卷宗。

## 2) 拉祜族和佤族

教会在景颇族地区的成功,尽管没有取得大大的收获,但对云南天主教的发展仍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更坚定了传教士们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活动的决心,自1928年开始,大理教会的法国传教士席兆清(Oxilar)便不断深入滇西南边境一线的拉祜族和佤族聚居地区开展活动,并在澜沧县文东区大平掌建起了教堂,开办了教会小学,在此基础上,伯大郎圣心会于1929年接管了新设立的大理教区教务工作之后,大批传教士相继进入这一地区,教会活动从此获得了较快发展。至1950年为止,先后以东河区大拉巴教堂(总堂)为中心,在澜沧县北部的文东、东河、上允、富邦、南岭等五个区的范围内建起了大小教堂30座,发展拉祜族和佤族信徒4200余人。<sup>①</sup> 本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外来传教士的离去,当地教会活动处于后继无人的状态中,逐渐归于消失。

## 三、天主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分布及特点

从整体上看,天主教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分布,大致集中在东、西两个区域之中,其间又涉及到不同的民族及社会文化背景,从而表现出各地不一的特点和差异,以下分述之。

### 1、东部的彝族和苗族地区

综观天主教在云南彝族和苗族地区的分布及活动情况,可以看出其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云南彝族和苗族地区的天主教分布,主要集中在昆明以东的大片地区,北起滇东北与四川接壤的盐津县,南至滇东南与越南毗邻的屏边县,呈现出大分数、小集中的分布状况,其中以彝良

<sup>①</sup> 澜沧边工委:《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简单情况》(1959年),思茅地区档案馆藏。

角奎、盐津龙启、罗子一窝风,路南圭山、沪西阿盈里、弥勒西山、开远噜哪克(现属砚山县)、屏边新华、和平等地最为集中,从地理位置上看,这片地区位于沟通云南与内地联系的门户地区,是中原文化进入云南的主要通道。天主教由内地传入云南后,首先就是由北向南而在这一地区获得发展的,本世纪初期随滇越铁路的通车而由越南北进的天主教,也是在这一地区获得发展的。又从民族类型上看,这一地区是彝族和苗族分布的主要地区之上,出于文化上的同一性,在天主教由滇东北地区南下以及由越南北上的传播活动,较为容易在这一地区扩展开来。再从社会形态上看,这一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已有了较程度的发展,有利于教会利用封建土地关系延揽信徒。例如,在滇东北地区活动的教会,曾先后在会泽、彝良、盐津、镇雄和昭通各地购买土地 1000 亩左右,<sup>①</sup> 出租给当地农户耕种,并借此而使这些农户大多成了天主教信徒。同样,在屏边苗族地区,教会利用购买的大片土地,无偿地分给教徒耕种,使很多农户为此而信教。<sup>②</sup>

第二,云南彝族和苗族的天主教信徒分布主要以自然村寨为单位,表现出较高的集中程度,如泸西县的阿盈里村,全村 132 户彝族全是信徒,<sup>③</sup> 路南县圭山海邑中寨 86 户彝族亦全部信教,<sup>④</sup> 而屏边县和平区岩峰及其邻近几个苗族村寨,约有 2/3 的人是信徒。<sup>⑤</sup> 这种状况,既与彝族和苗族在这一地区多以村寨为单位聚后的状况有关,也与上述第一点所谈的情况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三,从这一地区彝族和苗族之间在信仰天主教方面的差异

① 参见黄锐:《昭通天主教简史》,载《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② 参见《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云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6 页。

③ 王国红:《天主教基督教在红河地区的传播及特点》(未刊稿)。

④ 《路南圭山彝族撒尼支社会历史调查》,载《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⑤ 参见《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云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6 页。

来看,天主教在彝族中的分布较为广泛,整个云南东部地区几乎都有分布,而在苗族地区的分布则较为狭窄,主要集中在以文山、屏边二县为中心的南部地区,这种分布状况,固然与苗族在这一地区的分布多集中在南北两端有关,但如果用南北两端彝族和苗族的信徒情况作比较,就可知并非仅仅如此。例如,在滇东北地区,虽然苗族人口略多于彝族,但信仰天主教的主要是彝族,苗族中的信徒比例远远低于彝族,而在红河州范围内,信徒比例如大致相同而以苗族略高(分别为0.5%强和0.6%弱)。此种差异也许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就我们目前的认识来说,彝族和苗族之间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以及天主教自身的文化特征,显然与这种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滇东北地区,无论在社会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统治方面,彝族都处于主导地位,苗族则处于依附地位,而在滇南的大部分地区,彝族和苗族之间的这种统治和被统治关系基本不存在,二者的社会地位大致相同。因此,与封建统治有较多牵涉的天主教,在彝族和苗族地区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在滇东北地区的以彝族为主体,而在滇南地区则相对平均的分布状况。

第四,从这一地区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分布差异上看,在这一区域的北部,即在滇东北地区,信仰基督教的主要是苗族,信仰天主教的主要是彝族,而在南部,基督教多分布在城镇,以汉族为主要传教对象,而天主教则多分布在农村,以彝族和苗族为主要传教对象。造成这一状况的基本原因,除上述第三点所谈的外,还与这一地区的苗族的支系间差异,以及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在传播过程中使用的文字媒介有浪大的关系。一般而言,天主教在传播过程中,主要使用汉文经典,<sup>①</sup>而基督教主要使用少数民族文字。因此,在滇东北地区,使用苗文经典的基督教就比使用汉文的天主

<sup>①</sup> 在局部地区如路南圭山等地的彝族中,天主教也曾创制使用了彝族文字和彝文经典,但从整体上看,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教具有更多的优势,更容易为苗族群众所接受。但在这一区域的南部地区,由于苗族支系和语言的差异。基督教所拥有的文字优势基本丧失殆尽。只能借助汉语传播,这样也就难以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同历史较久、与当地封建统治有较多牵连的天主教争夺信徒,仅能在以汉族为主的城镇自由民中开辟传教市场。

总之,天主教在云南彝族和苗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状况,是受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条件、民族特点以及教会本身的文化特征所制约的。其中,关于社会和民族方面的因素,我们在本书正文讨论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的一些基本关系时,已多次论及,至于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差异问题,将在后面作进一步讨论。

## 2、滇西西腹地的白族地区

与彝族和苗族地区不同,白族地区的天主教,可谓云南封建地主经济条件下天主教传播发展的典型,也是传教士殖民恶习暴露得最为充分的地区。在这样的条件下,天主教在白族地区历经上百年的传播发展,虽颇费苦心,但终究未能形成较大的影响。究其原因,大致可看出如下两点:

第一,天主教之所以能够在白族地区立足,固然与教会在当地的扩张活动有关,但同时也与白族地区的社会状况有直接的联系。早自唐朝大理国时期以来,大理白族地区的封建土地关系使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这种状况,无疑对与封建土地关系有较多联系的天主教会的建立是有利的。在此基础上,虽存在着白族传统文化和社会意识的制约,但白族地区以汉地佛教及道教为中心的信仰意识,如前所述,对外来宗教的抵制在总体上是比较小的。

第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天主教会与当地封建化因素的较密切关系,促成了传教士殖民恶习的极度膨胀,并由此导致了这一地区仇教心理的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了对教会发展的否定性局面。在白族地区,关于传教士强取豪夺、恃强凌弱,踞傲不逊、包揽辞

讼、夺田霸产、草菅人命,欺压百姓的劣迹随处可见,甚至连“初夜权”这样的恶行也时有所闻。因此,白族地区成为云南天主教史上教案及仇教事件的高发地区是不奇怪的。很显然,不良的教会形象和传教士们的殖民恶习,不仅是教案和仇教事件的导火索,也是教会在当地难以发展的重要原因。

天主教在云南白族地区的传播活动,尽管费尽苦心,最终未能取得成功。虽然本世纪初以后,随着时局的发展和西方传教政策的变化,教会的殖民性扩张活动有所改变,传教士们的殖民气焰也有所收敛,但教会在白族地区久已形成并深入人心的不良社会形象,却始终难以泯灭。相反,在云南西部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大理教会为主的传教活动,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发展。

### 3、滇西北的藏族、傈僳族和怒族地区

从总体上看,天主教在滇西北地区的分布,主要以藏族聚居的德钦县南部,以及傈僳族聚居的维西县和藏、怒杂居的贡山县北部为中心,集中在澜沧江沿岸的狭长地带内。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这一地区属于北部的藏族、东部的纳西族和西部及南部的傈僳族这三种不同文化的交汇地区、尽管这一地区天主教信徒的民族成份较多,包含有藏、傈僳、纳西、汉、怒等民族,但主要体现了北部的藏族(包括怒族和纳西族)和南部的傈僳族之间的特点和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表现为北部藏族地区的封建领主经济和农奴制,与南部傈僳族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维西地区)及村社经济(怒江州)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表现为北部传统的藏传佛教与南部传统的原始宗教之间的差异,这两方面的差异,无疑对天主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具有不同的制约作用,从而也促成了教会在活动方式上的不同特点。

首先,与北部地区封建领主经济和高度集中的土地关系相适应,天主教会在德钦和贡山等地的活动与控制土地有着较为密切

的联系。例如,在贡山县丙中洛地区,1905年爆发的教案结束后,白哈罗教堂借赔偿之机,将迪麻洛、查腊、青纳桶等地原属当地藏传佛教大寺(普化寺)的土地及农户划归己有,<sup>①</sup>在那里建起了教堂,利用土地的租佃关系迫使许多人成了天主教徒。再如,在藏族地区天主教活动中心之一的茨菇村,传教士们“收买了当地头人,兴办了一所教会小学,入教者免费入学,又与康普啦嘛寺勾结,用代其在次古(茨菇)佃户承担银租的办法,将佃户交给寺庙的粮租拨归教堂,直接控制了这部分佃户群众,诱使他们信教。”<sup>②</sup>茨菇教堂被毁,教会活动中心迁至附近的茨中村后,教会更直接占有该村1/10的土地。这种利用土地迫使人们信教的手段,在当地成了教会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与此不同,在南部的维西傈僳族地区,由于地主经济较发达,土地集中程度及时农户的控制程度较北部地区为低,教会则更多地采用了行医办学、开展慈善活动等传播手段,吸引人们信教,相比较之下,在怒江傈僳族地区较为松散的土地关系中,教会更加难以利用土地作为传播手段,因而一直未能深入其中,由于土地关系的不同,天主教在北部地区的影响,也就因之而大于在南部地区的影响。

其次,尽管教会在北部地区拥有较大的影响和较多的信徒,但由于较为统一而严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统治,以及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对天主教的传播发展具有更大的制约作用。教会活动既可以借此获得较快的发展,也因此而更容易受到来自社会的反对。因而北部地区的教会在传播过程中所遭受的打击也较大,曾经历了数次教案和仇教事件的打击,教会发展很不稳定,而在南部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较为松散,传统的原始宗教

<sup>①</sup> 彭恩德等:《贡山天主教及“白哈罗教案”简况》,载《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sup>②</sup> 《天主教活动情况调查报告》(1965年),迪庆州档案馆:1-1-406号卷宗。

对天主教的抵制较弱,因此尽管教会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和发展较为缓慢,但却基本保持了稳定的发展趋势,没有受到更多的教案及仇教事件的冲击。

#### 4、西部边回少数民族地区

与教会在东部地区较为统一的连续性分布不同,天主教在西部边疆地区的分布,由于地区间的不同民族及社会文化的影响,则表现出区域性的间断分布特点。综观天主教在滇西傣族、景颇族以及滇西南拉祜族、佤族地区的活动,可见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从教会分布情况看,在滇西地区,尽管傣族在德宏地区分布很广,但天主教的分布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仅限于北部傣族分布地区边缘的盈江县沙坡及附近地区,并在当地具有较高的集中程度,如沙坡的信徒就达到近 50% 的较高比例。<sup>①</sup> 造成这种分布状况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一地区位于傣、汉、景颇、傈僳等多种民族和多种文化的文汇位置,与傣族聚居的中心地区相比较,当地的傣族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社会影响相对薄弱,对外来文化的抵制也相对薄弱一些。另一方面,这一地区是整个傣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教会能够较为容易地利用控制土地、制约佃户等手段促进教会发展。事实上,这一地区的天主教堂均不同程度地占有土地。其中沙坡教堂的田产每年可收租 800 多箩(每箩约 20 公斤)并以收租在放贷的方式间接地对人们产生影响。这与当地在景颇族地区活动的基督教仅有少量教会自用土地有着较大的不同。

与教会在傣族地区的分布有所不同,天主教在景颇族地区在相对分散的区域中表现出点式集中的特征。在陇川县,据 1955 年的调查,全县 81 户信徒分散在大约 8 个乡的范围内,但其中仅户

<sup>①</sup> 参见盈江县工委:《关于宗教工作的情况》(1955 年),保山地区档案馆 067(长期)卷宗。

弄、垒良两个乡就集中了 39 户。<sup>①</sup>而在瑞丽县的信徒中,半数以上集中在户兰乡的允岗、等戛乡的不兰格同、雷弄乡的木棵三个村寨,信教人口均为同村总人口的大约 50%。<sup>②</sup>这种分布状况,与基督教在当地的大分散、小集中分布特点大致相同,一方面与当地傣族上司和景颇族村社头人的区域性和村社性统治状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天主教在当地主要是借助基督教的发展势头插足其间的传播状况有关。

与教会在傣族和景颇族地区的分布大致相同,天主教在拉祜族和佤族地区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澜沧县北部地区,不仅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特性,且具有较高的集中程度。虽然从统计数字上看,在当地有教会活动的五个区(乡)的较大范围内,信徒比例权力 10% 左右,但如果有足够的材料将其缩小到村寨的范围,则当与傣族和景颇族地区具有同样的分布特点及集中程度。

第二,从活动方式上看,与傣族地区不同,天主教在景颇族、拉祜族和佤族地区的活动很少与土地发生联系,它在当地的传播和发展,主要是借助于当地历史较久,影响较大的基督教的传播和影响而获得的。因此,在其活动方式上,一改以往与基督教有着较大差异的状况,形成了逐渐同化甚至更加世俗化的趋势,以致于人们往往只能根据景颇族信徒门头上有否十字架来确定他是否天主教徒,这种活动方式上的转变,尽管对教会本身来说意味着某种丧失,但对于天主教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则是十分有利的。这一点,在滇西南拉祜族和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教会发展中,就表现得更明显了。

在拉祜族和佤族地区,教会活动主要采取直接面对群众的方

<sup>①</sup> 参见《陇川县天主教堂教徒调查统计表》,保山地区档案馆 067(长期)卷宗。

<sup>②</sup> 参见《瑞丽县基督、天主教徒分布情况》(1964年),保山地区档案馆 111(长期)卷宗。

式,通过开办教会小学、行医送药等办法博取人们的好感,“用大脖子药等灵验的药为人治病,贷放五荒、六月杀几条牛和猪分给穷苦人、买盐巴布疋卖给保黑(拉祜族)卡佤(佤族)、收养孤儿,很得民心,”致使50年代教会逐渐停止活动以后,“群众很怀念神父发药吃教孩子读书的情景。”当然,尽管教会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很快,甚至超过了在景颇族中所取得的成绩,但由于传教士难以摆脱的殖民意识和文化优越感,他们的活动又往往会遭致人们的反对,从而对教会发展产生阻碍作用。例如,传教士们“因和基督教争教徒,在文东区挑起了民族内部的不团结,又因其自称神仙而使有些保黑害怕,不准他们建堂。另在东河区的多衣林又不尊重地方风俗,在南岭区锡饼的后山上埋死神父而使当地人民大不满意,故其势力仅在黑河北岸……南现锡饼和多衣林则一般人对教堂很痛恨。”<sup>①</sup>

第三,从影响上看,在信教人数方面,尽管天主教在西部边疆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在拉祜族和佤族地区的发展很快,但较之于基督教来说,不仅信徒人数远远不及,而且影响也小得多,这种状况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天主教在当地开展活动较晚的缘故,同时也与教会本身的活动方式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如上所述,尽管传教士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活动方式有了很大的转变,但仍具有相当浓厚的殖民色彩,因而也就受到了比基督教更大的抵制和阻碍。另一方面,在培养教会传人上,鉴于教会体制方面的限制,天主教显然比基督教更加缺乏相应的灵活性,虽也开办了不少的学校,“但因没有开过训练班,大部分忠实教棍均从外地派来,这样,当外来者离开之后,活动使自行停止了。”<sup>②</sup>

此外,天主教在拉祜族和佤族地区所发展的信徒中,大多数是

<sup>①</sup> 以上引文见思茅地区档案馆藏:《澜沧县天主教情况》(1951年)。

<sup>②</sup> 澜沧边工委:《澜沧地区宗教工作情况及问题》(1958年),思茅地区档案馆藏。

拉祜族,佤族仅占少数,这与基督教在当地的情况是一样的,其原因也与基督教在当地所受到的源于民族和社会方面的制约和限制是大致相同的。

总之,天主教在云南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活动,与东部及西北部地区的教会活动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差异。这不仅体现在教会历史的长短、信徒人数的多寡、教会影响的大小等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教会生存环境及活动方式的变化方面。而正是由于后者的不同,导致了本世纪20年代以后,云南天主教发展的主旋律由东部和中部地区向西部边疆地区转移的变化。